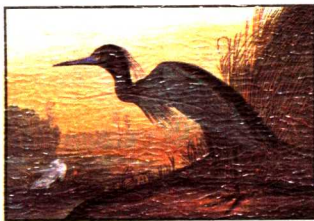


铸魂学

钱理群

文 匯 出 版 社



阁 楼 文 丛

学魂重铸

孔庆祥



铸魂重学

钱理群



文匯出版社



阁楼文丛(第三辑)

学魂重铸

著 者/ 钱理群

责任编辑/ 季桂保

封面装帧/ 周夏萍

出版发行/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市青浦任屯印刷厂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32

字 数/ 111,000

印 张/ 7.75

印 数/ 1-6000

ISBN7-80531-535-7/I.56

定 价/ 10.00 元

第一辑 教育的追问

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3)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19)
北大百年:光荣与耻辱·····	(43)
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关系之考察·····	(63)
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93)
追求文、理的融通·····	(104)
精神对话与学术漫游·····	(121)
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	(131)
愿老师与母校青春常在·····	(144)
用文学经典滋养下一代·····	(148)

第二辑 学魂重铸

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的艰难维护·····	(155)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	(175)
献身学术·····	(189)
沉潜十年·····	(195)
无忌的童言·····	(207)
“追寻可能的世界”·····	(209)
跨越精神死亡的峡谷·····	(216)
学术自述·····	(223)
后记·····	(242)

第 一 辑

教育的追问



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中国有所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有个未名湖。

未名湖畔有尊蔡元培校长的铜像。

——这都是中国风景中的永恒，

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蔡元培先生的铜像是“文革”结束以后第一批北大学生自动发起建成的，是北大人用自己的心垒成的。

北大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周年校庆，北大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老校长。

于是，纽约校友集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先生暂厝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在北大红楼的孑民纪念室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

这一切自然不会得到回应。就连北大在校师生将自己写的纪念蔡先生的文章寄给某大报，也

被退回,理由是宣传蔡元培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但民间的纪念是不用批准的。心的纪念是不受批准与否的限制的。

而这建立在民间的心的丰碑,才是真正不朽的。

蔡先生也无愧于这样的民间纪念。因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转折:从庙堂走向民间,走向自身,正是从蔡先生对北大的改造开始的。

在此之前,无论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本世纪的辛亥革命,都是企图依靠国家的强权政治,或寄希望于政治强权人物,实行社会总动员与高度的组织化,以实现民族振兴,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主义”的思潮下,知识分子自愿牺牲个体的精神自由,而把自己置于依附于国家(或个人)的强权政治的地位,也就依然走不出鲁迅所说的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结果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在中国,任何强权统治都必然导致封建性的复辟。

于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觉醒:陈独秀率先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怒斥当局

“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指出“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所利用”，“爱国适以误国”，同时提出救国之道即在启发民众之“自觉心”。蔡先生也这样告诫国人：“当断绝政治上之迷信”，“认定教育可以救世”。因此，当1916年12月蔡先生于“大风雪中”来到北京，就任北大校长，登高一呼，很短的时间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影响一个世纪的民族精英聚集于北大，这正是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目光由国家转向民间，由强权政治家转向自身，由依附权势转向依靠知识（科学、理性）的力量，通过思想启蒙，唤起国人的自觉，自下而上地进行中国的思想文化、社会变革。而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根本思路、选择的大转变是在蔡元培先生的旗帜下实现的。蔡先生所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目的正是要为知识分子提供自由而广阔的精神空间，将北大改造成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是蔡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新范式：这是一批永远处于边缘地位（甚至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不仅摆脱了官的帮忙、帮闲的传统窠臼，而且也避免落入现代商业社会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忙、帮闲的陷阱，获得了真正

的人格独立与个体精神自由；他们永不停止对彼岸精神理想的追求，对精神（思想、文化、学术）的探索与创造，因此对此岸的现实存在总不满足，永远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永远是“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这是鲁迅对“北大校格”的概括，蔡元培先生所培育的“北大精神”，所指的就是北大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提供的这样一种独立的、自由的、批判的、创造的精神规范。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结晶，不仅是北大，而且是整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意义与价值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蔡先生的理想是“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他首先通过对北大的改造，创造了新的北大精神，提出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社会与文化理想，建立了新的道德伦理，又支持师生创办《新青年》、《新潮》杂志，通过现代传播媒体，影响整个社会，形成社会文化新思潮，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新文化运动。而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则进一步把由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变革推向全国的政治、社会的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爱国学生运动又反过来极大地提高了北京大学的声誉与影响。正是蔡先生领导与支持的一校（北

京大学)二刊(《新青年》、《新潮》)一时成为时代思想、文化、学术,以至社会、政治的中心。这是本世纪唯一的一次;民间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独立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凭借知识自身的力量,成为时代的主导,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历史的进程。影响所及,直到今天(世纪末)北大尽管已不再成为时代、社会的中心(这是必然的),但在国人心目中,仍然是一方“精神的圣地”。

北大教授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与学生发动的学生运动,固然有各自的领袖人物,如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胡适,五四学生运动中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但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北大在蔡先生主持下的短暂几年间,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除了当时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对软弱无力这一客观条件外,蔡先生个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响,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蔡先生既是前清翰林,又是革命元老,既是国民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又留学德国,在国内外教育界与学术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论学问与道德人格,于“旧”于“新”,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臻于完美而无可挑剔——他写得一手连复古派也望尘莫及的古

奥的“怪八股”，又深谙西方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他至仁至义至孝，被世人视为“真儒”、“真君子”，又深得“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思想的真谛；他性格儒雅平和而刚毅有决断，既如春风化雨又内含奇气，“是真虎乃有风”。在中国的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正是需要蔡先生这样的“承先启后”的人物，他的能够同时为新旧两派所接受的特殊地位，使得他在历史转折的开端时期空前尖锐的新与旧两派的斗争中，发挥着独特的、他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正像许多研究者所谈到的，他对北大师生中的新派（特别是新派中的领袖陈独秀）的支持、保护，使他们在北大“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这里，还要指出另一面，即是蔡先生在大力支持新派的同时，对新派的某些难免的过激方面，也有所制约，在这个意义上，他也保护了处在被猛烈攻击中的旧派，他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本身即含有让新、旧两派在自由竞争中发展，从而保持思想文化发展中的“生态平衡”的意思。这使我想起了40年代朱自清先生逝世后，沈从文的一个评论。他

说,在大学里的每一个有成就的教授都是偏至的,即把他自己的学术选择推向极端,这才能形成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个性,而不能搞折衷,一折衷就平庸了;但作为系主任或校长,就必须宽容,折衷,这才能让同一个系(学校)里不同个性、不同学派都得到发展的机会,同时又相互制约,达到学术平衡、健全的发展。这样的“个体上的偏至、任性自由与整体上的平衡、制约”,正是一种理想的学术境界。以此观点看蔡先生当年在北大所起的作用,他不仅支持、保持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爱国学生运动,而且也有力地促成了运动的健全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没有蔡元培,没有蔡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学生运动,没有以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革。”——蔡先生正是以这样的形象,这样的作用与地位,融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教育史、北京大学校史之中,并化作“永恒”的。

但每回面对校园里蔡元培先生的铜像,我总想起“高处不胜寒”这句古诗,在我的感觉中,蔡先生是孤独的。

校庆期间由北大校友、师生创作、演出的话剧《蔡元培》里,有一句台词:“人人都尊崇我蔡元培,

可又有谁真正与我同道啊!”有人认为这会贬低蔡先生的形象,把他写消沉了。其实“孤独”几乎是所有先驱者的共同命运;如实反映这类思想超前造成的不被理解的精神痛苦,以及如何从这样的痛苦中挣扎出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这才是内在的(而不是表面的)写出了蔡先生的精神与人格力量。

且不说别的,单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蔡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要真正被理解就很不容易。曾有人指责这是“搞调和”,其实蔡先生自有自己的鲜明立场:他总是站在受压抑、无权势的弱者这一边。五四时期主张变革的“新派”(包括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处于不被承认的地位,因此,蔡先生的“兼容并包”首先要保护的正是新思潮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为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的改革开辟道路的,并非一味的折衷、调和。但蔡先生同时反对不加分析地对旧文化、守旧派文人采取一律否定的极端态度。他心中也有一条明确的线:当旧派试图借助政治、军事强权的力量来消灭学术上的异己(新派),如林琴南那样打上门来,他是要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抗击的;但如果仅仅是在课堂上坚持自己选定的保守性的学术立场,如辜鸿铭、

黄侃、刘师培等，他也是要坚决保护他们的学术自由权利的。这是与陈独秀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绝不容他人匡正”的极端立场是有区别的。这样，蔡先生要贯彻他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既要为新思想、新文化开路，又要保留旧的传统文化”，就必然要受到“绝不允许对方存在”的新、旧两派的巨大压力，并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直到今天（世纪末）人们才终于了解，蔡先生所反对的是将新、旧对立绝对化，“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思维，他主张的是学术上的不同派别（包括新派与旧派）在自由竞争中的多元发展。这就是说，二元对立的独断论一天不破除，蔡先生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就不会被理解与接受。事实上也正是如此，80年代末以来，如何看待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具体说，在今天的北京大学，还需不需要贯彻“兼容并包”的方针，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界与北京大学内部一直是存在着争论的。有的人只承认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甚至只限制在保护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这一点上，而认为“兼容并包”今天已失去了意义，再要坚持，就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伞”。这种看似吓人的“过时